

上海抗战与 国际援助

卞杏英 杨元华等著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欢迎各界慰问代表
中国学生救国会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上海抗战与 国际援助

卞杏英 杨元华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卞杏英等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唐培吉, 朱敏彦主编)
ISBN 7-208-03769-8

I . 上 … II . 卞… III . 抗日战争(1937~1945)
- 上海市 - 史料 IV .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505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装帧 孙宝堂

·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
卞杏英 杨元华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字数 197,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3769-8/K · 888
定价 20.0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抗击法西斯日本最早，坚持抗日战争时间最长，作出民族牺牲最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上海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与政治的副中心，当然成为中日战争中的必争之重地，先后发生了两次淞沪抗战；上海既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有着强大的西方势力和影响，同时上海又是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重要阵地，有着抵抗侵略者的有利的社会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上海的工农商学兵、各种政党派社会团体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上海人民不仅在军事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人民运用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地下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并把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进行着艰险顽强的抗日斗争，整整 14 年没有一天停止过斗争。概而言之，上海军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着长时间的、全方位的、各种形式的、卓有成效的全民抗战。上海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期的中心，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重镇，

是抗战文化的发源地,是抗日战争特殊的后勤基地,是联结各国人民的主要纽带。因此,上海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战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是值得很好研究的。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翔实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上海抗战的专著出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上海抗日战争史进行了研究。经过多年收集整理大量史料、深入讨论研究有关理论问题及虚心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终于完成了《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包括上海抗战史通论、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等。

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始终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并得到上海市社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上海地区抗日战争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个初步尝试,我们作者虽然作了很大努力,毕竟研究的时间不够长,研究的功力不够深,书稿上的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与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0年8月

引　　言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次年1月，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策划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在上海策动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两次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并非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侵略上海，不仅可以占领中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然而，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官兵再也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冲破南京政府“不抵抗”的禁令，以劣势装备奋起抗击残暴日军，为全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赢得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主持正义的政府和人民的尊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以上海两次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淞沪抗战而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真理。两次淞沪抗战，不仅是驻守淞沪军队的抗战，而且是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气声援，

而且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各国政府、各国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海外华人华侨的鼎力援助。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上海军民在两次淞沪抗战中“得道多助”的历史记录。淞沪抗战的炮声一响，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各国政府、社会团体和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在国际社会的各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上海军民的抗战表示了支持，并以实际行动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援助；一些正义人士还万里迢迢来到上海志愿参加战斗，有的还把鲜血洒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一些生活在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士也用各种方式投入上海抗战，甚至一些反对日本军阀、同情中国人民的日本友人，也投入了支持上海抗战的行列。海外华人华侨更是捐款捐物，充分体现了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深厚情义。

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从尘封的档案、当年的报纸以及前人的著作、回忆录中多方搜集资料，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年各国政府、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华侨对上海两次抗战的支持和援助，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加上我们水平有限，本书仍可能挂一漏万，许多事情可能只写了一个轮廓，一个梗概，没有能够充分反映当年那种如火如荼的热烈场面，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引起史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重视，能在此基础上有更全面、更精湛的研究著作问世。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一·二八”抗战前后的国际支援	(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	(1)
第二节 “一·二八”抗战期间的国际联盟	(17)
第三节 各国政府干预与《淞沪停战协定》.....	(25)
第四节 主持正义的国际友人.....	(35)
第五节 旅沪外侨支持上海抗战.....	(45)
第六节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57)
第二章 “八一三”淞沪抗战与国际援助.....	(61)
第一节 “八一三”淞沪抗战在国内外的影响.....	(61)
第二节 国际组织对上海抗战的支持.....	(79)
第三节 各国政府对“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援助.....	(94)
第四节 各国人民声援“八一三”淞沪抗战.....	(119)
第五节 各国人民抗议日军侵华暴行, 声援中国抗 战.....	(124)
第六节 日本人民与士兵的反战斗争.....	(139)
第七节 各国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八一三”抗战.....	(143)
第三章 “孤岛”和沦陷时期国外对上海抗战的援助.....	(161)

第一节	“孤岛”时期国际友人的抗日援华活动	(162)
第二节	英美等国在上海与日本的矛盾和斗争	(181)
第三节	日本正义军民的反战活动	(190)
第四节	“孤岛”时期的外侨支援	(195)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上海抗日斗争	(200)
第四章	“一·二八”抗战后海外华人华侨支援上海抗战	(210)
第一节	海外华人华侨热情援助“一·二八”抗战	(210)
第二节	海外华人华侨归国报效,共赴国难	(224)
第三节	身在异域,心向祖国的华侨领袖	(228)
第五章	海外华人华侨援助“八一三”上海抗战	(235)
第一节	华人华侨声援上海抗战	(235)
第二节	爱国侨胞以经济援助“八一三”上海抗战	(246)
第三节	爱国侨胞对淞沪抗战的人力支援	(256)
第四节	华侨对日经济制裁,间接支持上海抗战	(260)
后记		(266)

第一章 “一·二八”抗 战前后的 国际支援

当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炸弹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领土时,当千千万万渴望和平而又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在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屠刀下痛苦地呻吟时,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人们向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在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和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事业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和 “一·二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中国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仅仅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

就全部沦陷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恶性发展，急于向外扩张、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咄咄逼人气势妥协退让，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各阶级、各阶层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策动“一二八”事变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发起了著名的淞沪抗战。淞沪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也得到了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主持正义的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他们的支持和援助，给了抗战中的上海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侵华政策的制定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国策。明治政府刚一建立，在1868年3月14日以天皇的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天皇御笔信）中，便公然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充分表明了它将要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

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急于拓宽海外市场，掠夺原料，扩大资本，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为此，它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首先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造船工业，以扩充陆海空军实力。其次，是建立遍布国内的军事警察网络，以实现对国内人民的法西斯统治。

^① 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政府陆军大臣的武官制度,1878年12月又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日军参谋本部,使日本军部处于特殊优势的地位。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加强军国主义教育,强制灌输“忠君”、“武国”思想,要求军队和人民“克忠克孝”。通过以上措施,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迅速军国主义化。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竭力推行“富国强兵”计划的同时,积极制订对外军事扩张计划,并从一开始就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它的近邻中国。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制定了所谓的通过侵占中国的台湾,并以台湾作为基地向东南亚扩张的“南进政策”和以朝鲜为跳板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大陆政策”。1890年3月,日本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了先吞并朝鲜,进而征服中国的军事扩张政策,被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

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侵犯台湾,并轻易地从腐朽的清政府手中获得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以后,又于1879年把以武力夺取的琉球群岛并入日本版图,成为日本的冲绳县。

1894年春,日本又趁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机,在清政府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向中国驻朝军发动进攻,挑起了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95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在中国开埠设厂等利益,还强行割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并获得了对朝鲜的控制权,完成了对外扩张计划的极重要的一步。1904年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夺取了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后又通过《日俄密约》进一步将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由此,日本便把东蒙与南满联结

起来,当作自己独占的地盘,称为“满蒙”。这样,日本进一步实现了它的对外扩张的目标。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这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而无暇东顾。日本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天赐良机”。于是,它借口对德宣战而夺取了山东半岛和胶济铁路,把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占为已有。旋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于1915年与袁世凯订立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1916年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吸取前任内阁的经验教训,为了缓和过于激化的矛盾,采取向北洋军阀政府贷款的方式间接地加以控制、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在奉系军阀统治期间,日本的侵略势力又有很大扩展,基本上控制了东北的军政和财经大权。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大量事实表明,它的蓄意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早已形成并一步步加以实施。“九一八”事变是它“根本国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 1920年春,日本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商品滞销、生产停滞、物价暴跌、股市混乱,人民生活一落千丈,民怨沸腾。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引起了罕见的大火灾,东京、横滨等主要城市化为一片焦土。死亡及下落不明者10.6万人,经济损失达100亿日元。这场大地震带来的严重灾难,使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前景黯淡。1927年初,日本又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大城市的银行纷纷歇业。经济危机带来了政治危机,企业劳资纠纷不断,工人频繁举行罢工;乡村农民抗租、抗税斗争规模空前。为了摆脱困境,日

本政府欲把危机转嫁国外，他们把视线移向中国，阴谋策划侵华活动。但是，日本政府侵华活动的加剧，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涛。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1926年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都使日本政府惶惶不安，惟恐波及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首的新内阁于1927年4月上台执政。

田中义一(1863—1929)，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次长、陆军大臣等职。20年代初，晋升陆军大将，成为参与中枢机构决策的显赫人物。田中还是“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两个法西斯组织的会长和中央部理事长，也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三次出兵山东侵略中国领土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27年当选为法西斯组织“政友会”总裁。同年，这个法西斯头子当上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在一上台发表的施政纲领中就声称“中国的共产活动，不论其结果如何，日本之利益已受其影响”，“对维持东亚全局负有重大责任的日本说来，不能认为毫无关系。”^①企图借“反共”为名，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通过扶植和控制奉系军阀张作霖进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

为了转嫁国内危机，摆脱困境，田中加紧策划吞并中国东北、灭亡中国的阴谋。为了实现这个阴谋，在积极主张侵华的森恪、吉田茂等军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外相官邸主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官员有：外务省方面的政务次官森恪、事务次官出渊胜次、参事官植原悦三郎、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情报部长小林欣一、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崛田正昭；陆军方面的次官畠英太

^① 李新、陈铁健主编：《抗日潮流的起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郎、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海军方面的次官大角岑生、军务局长左近司政三、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大藏省方面的理财局长富田。此外，还有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享，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①总之，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大藏省、参谋本部、关东军、驻华公使和总领事等军政要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它的重要性。

这次会议开了 11 天。接着日本政府于 8 月中旬在中国的大连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因为这是第一次东方会议的继续，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两次会议的共同议题，都是讨论如何实施日本独吞“满蒙”的策略和措施。会议策划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份文件为了公开发表，欺骗国际舆论，采用了各种外交辞令，它的侵略实质还是无法掩盖。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头目、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则根据“东方会议”的决定，写成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 7 月 25 日秘密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的中心内容就是论证日本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奏折》中写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②《奏

①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上），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0 页。

② 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 页。

折》还歪曲历史，称“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

随着“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日本国内的侵华舆论甚嚣尘上，狂热地鼓吹对外扩张的军政要人、右翼团体及军国主义分子纷纷发表言论，叫嚣“满蒙特殊化”，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理论根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 1930 年新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加快了进一步吞并东北、灭亡中国的步伐。

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 1929 年 10 月，一场异常凶猛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就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下降，商品价格暴跌，银行陷于瘫痪，世界贸易骤减。据统计，这一破坏力空前巨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日本也未能幸免。日本 1927 年暴发的那场破坏严重的金融危机伤犹未愈，又于 1930 年遭到这场新危机的打击，日本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30 年同 1929 年相比，缩减 30.3%，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政局激烈动荡，日本统治集团频繁更迭。从 1927 年 4 月到 1931 年底就经历了从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再到若槻内阁、犬养内阁。走马灯似地更换内阁也摆脱不了内外矛盾的加剧。像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统治集团更加残酷地剥削本国人民。同时，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选择了疯狂对外扩张的政策，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当然它首先选择的目标就是中国，实现它早已制定的“大陆政策”，也是“东方会议”已制定的方针。在日本看来，此时正是它实施占领满蒙、进而侵略全中国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方面，欧美帝国主义各国被经济危机所困，在远东的实力大减，这样来自西方对手的阻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之时，国力衰竭，国防空虚。因此日本加紧了侵华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日本政府采取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政策。日本政府把主要的经济力量用于军事工业,急剧扩大军需物资的进口。日本进口军需物资的费用所占贸易进口总额,1928年为39%,1929年、1930年增至41%。1931年夏秋间,日本已能自制轰炸机、战车、高射炮等重型武器,并初步完成了机械化兵团的装备。另外,可随时用于军事的化学工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日本当时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常备陆军有23万人,还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

日本在迅速地完成军队机械化以后,立即投入到对中国的武力进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上来。从1931年3月开始,日本先后派数十艘军舰进入中国海港,官兵登陆侦察,举行由滨松到大连间的轰炸机直航演习,把适应在寒冷气候条件下作战的部队调入东北,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改革关东军的配备和调整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命令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作好越境和援助关东军的准备,等等。

随着日本对华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一就绪,军国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地要发动侵华战争了。他们故意挑起事端、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在此期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日军侵华战争的序幕。

万宝山是位于长春以北约30多公里的一个有十来家商店、1100多人口的小镇,既不是“满铁”的属地,也非《中日图们江界约》所规定的特区,纯属中国政府所辖之地。这里地域偏僻,远离城市。1931年4月,地痞、汉奸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建立私人长农稻田公司,自任经理。这家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就是包揽大面积农田,租给朝鲜侨农耕种。郝永德依恃日本势力,欺压中国百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1931年五六月间,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与郝永德勾结,在中国县政府不予批准的情况下,